

文章编号:2095-0365(2016)01-0101-05

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发展轨迹研究

——以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为例

包桂影¹, 张媛媛², 李小俊³

(1. 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2. 石家庄学院 化工系 河北 石家庄 050035;
3. 石家庄铁道大学 四方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228)

摘要:探究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本质上的异同,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意义重大。以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为基点,从三个方面对中、欧古典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阐述:“崇圣尚礼和经世致用”的书院精神与“尊崇探究,追求自由”的大学精神;受儒、释、道不同宗教文化孕育的中国书院和以基督教神学为唯一精神核心和行为准则的中世纪大学;几近接近却又自成体系的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最后概述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各自优秀的教育传承对现代大学的影响和启迪。

关键词:中国书院;中世纪大学;儒释道文化;基督教文化;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16.01.19

中国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是在改造传统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种独立的、区别于官学之外的、具有高度民办性质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于隋唐,经唐末五代时期的演进与传承,到宋代时(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高等教育组织,承担起读书治学和聚徒讲学的双重职能,名扬燕赵大地的封龙书院便是创办于这一时期。创建于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在僧侣教会学校和城市世俗学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以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法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高等教育组织,到十三世纪时期逐渐趋向成熟,巴黎大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中世纪大学始创于日耳曼蛮族征服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在日耳曼、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三重文化运动的冲突、整合过程中,基督教以其传统文明传承者和保护者的身份完成了与日耳曼、两希文化(古希腊和希伯来文

化)的融合,成为西方各国精神信仰的根基,也催生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一、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的历史变革

(一)乱世中崛起的封龙书院

“封龙书院”于五代末北宋初正式进入中国书院的行列,在此之前曾经是东汉李躬、唐代郭震等学者的授业之地。书院挂名之初,恰逢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的动荡年代,期间战争连绵不断政权更迭不暇,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以至于社会上官学凋敝私学盛行。正是在这一时期,李昉(925—996年,后汉乾佑年间进士、后周翰林学士、宋太宗宰相)于后周年间(951—960年,梁勇:《封龙山历史年表》)一度辞官重返故里来到封龙山,重修封龙授业之所并为其正式命名。至此封龙书院不仅成为李昉收徒讲学之地,也成为北方

收稿日期:2015-03-25

作者简介:包桂影(1966-),女,副教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文化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5JY018;2015040316)

本文信息:包桂影,张媛媛,李小俊.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发展轨迹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1):101-105.

名盛一时的教育圣地。

封龙书院坐落于石家庄元氏县境内的封龙山南麓,其沟深林密环境秀美幽静,自古是佛、道信徒讲经释道、修身养性的绝佳之地。早在晋代时期高僧释道安便在此讲佛译经。封龙书院的选址、教学不仅深受佛、道文化的影响,更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润,它始终把修己至诚、志趣高远作为学生教育的宗旨并发扬光大,由于学风纯正、名仕云集,书院的声誉不断增强。至金末元初(公元1279—公元1368),尽管整个国家依然战火连绵,但封龙书院的发展却走向了辉煌。期间,幼年曾求学于元氏的金正大末进士李冶(公元1192—公元1279)弃官返乡,对封龙书院进行了再次修缮并开始讲学授课。李冶高深的文学造诣和数学天赋吸引了大批名士、学子:著名诗人元好问、元宣抚使张德辉就曾游学于封龙书院并亲自担任讲师;集贤学士焦养直、翰林修撰王德渊、著名戏剧家白朴(元曲四大名家之一)和李文蔚等,都是封龙书院培养出的经世致用之才。另外,李冶曾经编撰专门介绍天元术的著作《测园海镜》,但是由于内容繁杂,普通学者难以读懂,为此李冶在授课之余,在封龙书院又编写《益古演段》一书,对《测园海镜》进行释义和推广。李冶两部数学巨著的问世,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数学教学的最高成就,也奠定了封龙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 追寻自治之路的巴黎大学

创立于9世纪的巴黎大学,是在原来巴黎圣母院和其它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兴建而来,于1180年正式获得法皇路易七世授予的“大学”称号。

巴黎大学的诞生恰逢中世纪欧洲社会趋于稳定、手工业和商业快速发展、宗教神学盛行之时。尽管巴黎大学起源于教会,一开始就不得不在教会和世俗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但当时巴黎是基督教文化和世界各种文化交织的中心,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的交锋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学者和学子,也为巴黎大学的自治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之后虽然大学在较长时间内不得不接受教会的监管和约束,但也组建了类似于城市行会的巴黎教师团体,以便抵制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和当地市民的侵犯,该团体成为今天巴黎大学自治模式的前身;另外,为争夺各自在大学的利益,教皇、国王多次授予巴黎大学管理特权,这使巴黎大学有机会成立自己的大会议自治制度;1208年罗马教

皇伊隆桑三世终于授予巴黎大学师生自定章程的特权,此举使巴黎大学的自治之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十五世纪,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王权政治的强化,巴黎大学享有的特权逐渐被取消,但是巴黎大学的世俗化进程打破了教会对大学教育的绝对垄断,奠定了巴黎大学实现全面自治的基础。

(三) 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真谛

封龙书院和古典巴黎大学仅仅是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兴办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特点是中国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山书院等)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流变过程中特点的具体表现。封龙书院具有创建时间早、培养人才多、历史贡献大等特点,虽然无法享有宋代四大书院之名气,但它在兴办过程中基本契合了中国书院的创办公理念、宗教氛围、组织结构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巴黎大学对其它欧洲大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深远,甚至许多大学直接照搬它的建校模式,故而巴黎大学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封龙书院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书院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和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大学所体现的敢于追求自由、探求真理的教育信条,都为后世大学的创立构建起良好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规则。

二、创建理念的二重性

(一) 中国书院的创办公理念

作为儒家之道的象征,包括封龙书院在内的中国书院在创建之初就体现出儒家士人的二重性。首先,中国书院以精神再造为内涵^[1]、以培养学生崇圣尚礼、修养人格为宗旨,以传承和创新中国文明之德性为目的。书院一贯重视对学子个人德行的培养,把“化育人才”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丽泽书院山长吕祖谦(公元1137—公元1181)在为其书院所制订《丽泽书院学规》开篇便说:“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2]”;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领袖朱熹(公元1130—公元1200)则把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的品德培养作为书院的信条;封龙书院山长安熙也曾提出“教人以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大清一统志》)”的教学理念。众家书院制订学规、学则的目的都是为学子营造一种醇儒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独善其身、内圣外王的儒家精神。其次,书院教育秉承传道济民、经世

致用的教育方针,把“重践履、务实行”的心怀天下精神贯穿于日常教学之中。朱熹一贯主张的“学贵利行”思想和李冶开创数学教学之先河的行为,都是要求学生做到身体力行、经世致用,把“求道”与“兼济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书院的教育理念既契合儒家“教化人”之学说,也满足了国家对经世治国人才的需求,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儒学思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卓越非凡的治世贤臣。

(二)中世纪大学的创办公念

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始终把探究真理、追求自由作为其教学的精神内涵。正如英国教育家纽曼所说,“大学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共同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4]。”虽然欧洲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出现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中世纪大学精神的核心却是来源于基督教新思想。当时,吸收了两希文化精髓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渗透到西方文化的各个角落,更流淌在欧洲各个阶层人士的血液里,人们对上帝、对神的无限崇拜和虔诚,促使他们对基督教超验主义进行不断的探索,这种“探索精神”不仅成为中世纪大学发展的动力,也使得智慧间、知识间的碰撞得以深化、真理得以检验和完善,久而久之,“探究精神”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价值追求。其次,“追求自由、寻求自治”是中世纪大学创办过程中所体现的又一特性。随着十一世纪欧洲经济贸易的逐渐繁荣,新兴城市的不断崛起,城市的一些手工业行会、市政当局着力打破教会几百年来对教育的垄断,自发地创办了一些世俗学校,以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出于自身谋生的考虑,从一开始就试图摆脱教会、市政等机构的束缚,模仿手工业劳动者的行会模式发展起自己的教师行会,并通过收取学生费用和社会捐助的方式来达到“自由自治”的经营目的,从而实现其专门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谋生需求。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巴黎大学于1208年首先获得教皇特许的师生自治证,为其它大学的自由自治树立了榜样。

三、独特的宗教影响背景

(一)多重宗教信仰浸润的书院

中国书院深受儒、释、道三种不同宗教文化的浸润,“融突和合”精神始终贯穿于书院教育的各个阶段。魏晋南北朝之后,曾一统中国文化阵地的旧儒学,已经不能和博大精深、充满思辨哲学的佛、道相抗衡,儒学佛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至隋唐时期佛、道已发展到它们的鼎盛时期,寺院道观遍布华夏大地。寺院道观的普及为书院的创建打下了物质基础,因为许多书院就是在寺院、道观的旧址上改造而来。尽管儒家为了再度崛起与佛、道进行了长期抗争,但作为一种群体自觉他们后来积极援佛、道入儒,以至于明朝大儒黄馆谈到“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禅”(黄馆《明道篇》)。由此不难看出,儒家学者曾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周敦颐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太极图说》就深受佛教禅师寿崖和尚影响,同时他的“无极生太极、阴阳互化而万物出”学说又体现出道家阴阳平衡的思想^[5],故而他的《太极图说》被认为是一个以《易》为媒介,集儒、释、道文化为一体的宗教融合体;朱熹则在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基础上论述了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在他看来:道就是理、道就是《易》之太极,“理、太极、道”实为一体,因为它们都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正是在禅宗、道教思想的影响之下,朱熹才完成了儒家对形而上精神的探究,使儒学的学术体系更加完整,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伦理。

之后,人们把这种“儒释道”高度融合的新学说称之为新儒学或“宋代理学”,而“宋代理学”的形成促进了宋代书院的长足发展,使书院教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归一。在此背景下,以儒家社会伦理为主,以佛、道思辨哲学为辅的新儒学——宋代理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发挥起对书院教育的引领作用,朱熹的“天理学说”哲学体系也成为中国书院无可替代的教学素材。

(二)基督教神学影响下的大学

基督教是中世纪大学唯一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在中世纪文化出于荒蛮状态时,承担起拯救和重建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欧洲最初的知识活动都是在这组织——修道院内进行的。随着基督教的壮大,教会需要大批的神职人员为其服务,为此许多修道院开始兴办学校以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教育向学校转移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育革命,正是这

场革命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中世纪大学创建之后,集宗教道德和封建伦理学为一体的“神学”成为大学教育的灵魂,也成为支配中世纪大学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宣扬基督教精神、解读基督教教义、研习基督教教规成为大学的主要学习内容,一切和神学无关的自然哲学等都被剔除大学课堂,即使创办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也转变为研究戒律的教会法,其它科目只是被视作研究神学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以上帝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体系在有着强烈宗教色彩的大学得到顺利传承^[6]和传播。

四、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

(一)中国书院的组织结构

1. 中国书院的管理体制

书院是以私人创办和管理为主的民间性教育机构,通常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二为一的自行管理体制。但宋代理学盛行,书院在管理上也借鉴了许多官学的经验,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的适合书院自身发展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其次,由于书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教力不足而对人才又渴求的矛盾,朝廷也采取积极扶持和鼓励政策,经常捐赠或赏赐大批图书或田产给书院,以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

2. 体系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

“山长”是书院的最高领导者,总揽书院的一切行政、教学事务,同时也为学生开堂授课。山长的选取遵循一定之规,一般邀请德才兼备的鸿学大儒来担任,如范仲淹、朱熹以及封龙书院的李冶等都曾做过书院的山长。在此基础上,书院还通过建立“学规、学则、教条”等手段来规定书院治学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等,这样既从宏观上确定了书院所遵循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也从细微之处规定了学生在生活、学习过程中的日常行为规范。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王守仁的《教条示龙场诸生》都曾在书院的兴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成熟规范的教学过程

首先,从教学的主导者——教师来看,书院教师以新兴儒学代表理学家和著名学者为主,他们往往能够通讲多部儒家经典,并在某一领域成就非凡,因此他们所在书院也经常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藪之地,如朱熹做山长的白鹿洞书院就成为理学研究的中心;其次,从书院的教学内容看,大部

分书院是以习学理学为主,宋、明大师的著作、讲义是书院的主要教材,学术思想建立在引经据典的“考据学”基础上^[7],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史学、医学、训诂学、音律学等科目,而像封龙书院在儒家经典之外又开设数学且成绩斐然者为数不多。

(二)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

1. 中世纪大学的管理体制

中世纪的许多大学都是在教会的支持或引领下创办起来的,教会理所当然的成为大学的庇护所和领导机构。另外,在基督教会极力宣扬“神权主宰一切、上帝高于一切”的时代,中世纪教廷也希望通过大学教育,为教会培养更多神职人员和教徒,所以他们自然地成为大学文明的保护者。再者,中世纪大学创建之初,欧洲各国战争连绵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很难形成高度集中的王权统治,因而当时没有任何与神权抗衡的王权政治能够控制、打压大学的发展进程,同时大学也往往利用教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赢得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权,如巴黎大学就率先争取到教师资格认证权和聘任权。

2. 自治性的内部管理机制

中世纪大学建有自己独特的管理体系,虽然基督教会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但是中世纪大学毕竟是一种典型的民间组织,它们虽然遵从教皇或教会制订的规章制度并以基督教教义为教学蓝本,但学校也参照中世纪城市盛行的行会制度,建立起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行会和以学生为主的学生行会,而大学校长则由教授会的主任和学生会的代表共同推选,这样大学在最大范围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并能以集体的方式摆脱教皇和教会对大学的束缚。在长期地抗争中,中世纪大学完成了环境分化和自身成长的蜕变,到十七世纪时逐渐迈入现代大学的行列。

3. 渐趋完善的教学过程

从教师队伍来看,中世纪大学教师资格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本人的学历层次、职业资格成绩以及个人职业上的魅力。面对教会对文化的垄断控制,教师们往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者甚至叛逆者(例如阿贝拉尔),他们经常团结起来通过罢教等方式来抗衡教会的势力,抵制一切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准则,到13世纪30年代,他们争取到教师资格的审核权,最终把自己从宗教神权的世界里解放出来;从教学内容看,神学是中

世纪大学所设置的主要的学科,教学内容直接来源于基督教教义、《圣经》及其注释。

五、结束语

纵观中国书院、中世纪大学各自的发展轨迹,它们在创建理念、宗教信仰、教学模式等方面,几近相似却又各不相同。尽管都曾遭受无数挫折,却也在各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世纪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宗旨、教育制度和宗教信仰,为相对独立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积极探索和追求自由的空间,师生们不仅有能力担负起文化保护和传递的责任,更养成了科学创新和自然创新的精神追求。尽管神权教育一度成为束缚人们追求科学和自由的桎梏,但对基督教信仰的探究、对希腊理性哲学的笃信,激发了他们创

建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信心,从而打破了基督教神学独霸讲坛的格局,为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作为古典高等教育的实施机构,中国书院虽然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是书院物化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书院精神的终结,它的凤凰涅槃为开启中国现代大学建设之先河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础,上至张之洞基于体制变革的“中体西用”论,下至蔡元培的学术自治以及梅贻琦的通识教育等等,无不传承者书院制度的优秀精神。在当今发展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大学的再度重生只有在借鉴欧美大学先进理论和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古典书院精神的有机融合,才能建立起一个“以仁爱为核心、以独立和自由为底色、以民主和科学为表征^[8]”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大学。

参考文献:

- [1]杨渭生.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J].浙江社会科学,2001(3):64-65.
- [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之《吕东莱文集》卷十[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197-198.
- [3]黄新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本义试析[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3):56-57.
- [4]崔清源.试论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变革与发展[J].教育与职业,2010(32):166-168.
- [5]黄广琴.朱熹的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22-23.
- [6]田增志.西方古典大学教育的宗教背景[J].教育界,2011(60):45-46.
- [7]郭娟.西欧中世纪大学与我国古代书院的比较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9):59-60.
- [8]黄英杰.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D].重庆:西南大学,2012.

On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Classical Academy:

In View of Fenglong Academy and Paris University

BAO Gui-ying¹, Zhang Yuan-yuan², Li Xiao-jun³

(1.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Shijiazhuang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3. Sifang Colleg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228,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essence an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classical academies and European medieval colleg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pap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englong Academy and Paris Universit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classical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academy spirit and the university spirit; the Chinese classical academies in the religious culture of Confucius,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medieval colleges with Christianity as their core of spirit; similar but unique structures of Chinese academies and medieval colleges. The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ositive inheritance and inspirations of Chinese academies and medieval colleges.

Key words: Chinese classical academy, medieval college, culture of Confucius, Buddhism and Taoism, Christian culture, higher education